关注劳工“最近的目的和利益”
——利奥十三世 1891 年《劳工通谕》以及美国天主教会的回应

彭 小 瑜
(北京大学 历史学系, 北京 100871)

摘　要: 教宗利奥十三世的《劳工通谕》是近代天主教社会思想的重要文献之一。这部文献对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进行了批评,同时又针对工业革命在西方引发的严重社会问题阐释了教会关于社会正义的观点。教宗的意图是改善广大劳工及其家庭的命运,捍卫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最近的目的和利益”。在这一方面,罗马天主教会与社会主义者有着共同的立场。

近代美国文化对社会主义有着显著和强烈的敌意。在这样的社会氛围里,天主教会内部的社会改革人士不得不刻意划清他们与社会主义观念和组织之间的界线。不过他们意识到,为了维持教会在现代社会的影响力,他们必须让劳工群众感受到教会不是资产阶级的附属品。这些改革派人士批评美国社会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复杂的现代经济生活很难被一个简单和刚性的理论设计所包括,因此私有经济、公有经济以及合作社制度都可以是一个健康的混合经济形态的组成部分。也只有如此,劳工以及整个社会“最近的目的和利益”才能得到良好的关照,他们才能真正获得生活的幸福感。

关键词: 天主教社会思想;社会主义;美国文化史;教会史
中图分类号: K 712.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19(2018)02-0139-15

教宗利奥十三世(1878 年—1903 年在职)反对社会主义的态度以及他的社会改革倾向,对世界各地天主教会在社会经济问题上的立场一直有很大影响。他就资本主义问题发布的《劳工通谕》出版于 1891 年,比《共产党宣言》晚了 40 多年,他在通谕中提出的立场也要保守得多,主要涉及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到的“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没有涉及在根本上改变私有制的问题。①

在整个美国社会内部以及在美国天主教徒中间原本就存在强大的反改革保守力量。在这一背景下,《劳工通谕》等教宗社会问题文件的一个直接影响,就是在肯定甚至推动社会改良的同时阻遏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运动与美国天主教会建立联盟,使得天主教会内部比较激进的改革派在借鉴社会主义这一思想资源的时候十分困难,不得不小心翼翼。尽管如此,他们在阐释利奥的改革观点的时候,不可能不受到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他们实际上不得不承认,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家必须出面进行经济调控和实施社会福利保障,教会在传统上认可的私有权不能是一种绝对和自私的个人主义私有权。他们中间的激进派甚至还不得不承认,社会主义是一种具有合理性以及正当性的思想资源和社会运动。正

收稿日期: 2017-12-27
作者简介: 彭小瑜,男,浙江杭州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① 我在这里参考的英文本见 Pope Leo XIII, *Rerum Novarum: Encyclical Letter on the Condition of Labor*, in David J. O'Brien and Thomas A. Shannon, ed., *Catholic Social Thought: The Documentary Heritage* (Maryknoll, New York: Orbis Books, 2010), pp. 14-40. 该通谕有戴明我的中文译本:http://www.jiezi.cn/new/article/2007/0909/article_440html(下载于 2015 年 5 月 19 日)。这个译本文字准确优美,是我在这里引用的文本。有些细微处可参考拉丁文本和法文译本,均见 http://w2.vatican.va/content/vatican/en.html。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工人阶级利益的论述,见《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84 页:“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

是因为这些改革家复杂的思想源流和多元多样的社会改良建议,他们的社会思想对 21 世纪的人们不仅依然有魅力,可能还具备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教宗《劳工通谕》的保守与激进

与 1878 年反社会主义通谕相比,1891 年《劳工通谕》对社会主义的批评重心有所转移,其主要内容在于捍卫私有权和质疑社会主义的经济纲领。①但是该通谕指出了资本主义的弊端,还提出一些在制度上改革现代社会经济结构的提议,与社会主义的一些观点有微妙的相通之处。不过在这里,我们首先需要提及 19 世纪天主教会社会思想的一个重要基础,即教会并不赞成 18 世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人道主义者一般都认同的平等观。

在最根本的层面,正如法国哲学家马里坦所分析的,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体制以自私为特征的个人主义是罗马天主教传统难以接受的。他将个人主义的起源归结到路德、笛卡尔和卢梭,认为他们分别在神学、科学和道德三个方面将单个人由社会关系中切割出来,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形成做了思想和文化的准备。马里坦承认,基督教的社会理想包括对人世间现状的改良。但是他的理解与卢梭的曲解不同,因为后者认为在尘世就可以单凭人的力量造就天国,将人自己偶像化和神化,否定个人服从社会公益的必要性。②对天主教社会思想基础的这一阐释对理解教宗的一系列社会问题通谕非常关键,有助于我们明白,天主教会为何保持着对资本主义的批评态度。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 17 和 18 世纪教会忙于应对来自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冲击,对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变化反应迟钝。要到利奥十三世任职的时候教会才对现代经济问题有了系统的回应。③

利奥十三世 1878 年的反社会主义通谕在最后几节涉及了教会对资本主义问题的批评,但是完全没有制度性的改革思路。该通谕的整个思路是以维护私有财产合法性(不等于是资本主义合法性)为核心来组织的。不过利奥已经注意到,劳工处境的改善需要依靠手工业者和工人自己的协会和组织。这样的视野与后来的《劳工通谕》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④

由其文本来看,1891 年的《劳工通谕》很清楚反映出教宗利奥对 19 世纪后半期欧洲格局的焦虑心情。他既担忧资本主义弊端的严重负面影响,也害怕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对劳工阶层的鼓动力量。在教宗看来,资本主义不仅将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的手里,而且让劳苦大众陷入几乎和奴隶制等同的悲惨境地:“工人阶级是被孤立无援的交付与铁石心肠的雇主和贪得无厌的竞争了。”利奥完全不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复杂性的阐释。教宗在为私有权辩护的时候,更多强调的是劳工个人以及农民和小资产者的财产权,而立即剥夺一切私有的财产,包括剥夺小农的财产,其实是巴枯宁派的纲领,而非马克思主义者当时计划在西欧实施的主张,而且正如恩格斯所认可的,社会主义政党应该关心小农,帮助他们组织现代化的生产,帮助他们适应新的

① 参见 Pope Leo XIII, *Quod Apostolici Muneris*, in Claudia Carlen, ed., *The Papal Encyclicals* 1878 – 1903 (Ann Arbor, Michigan: The Pierian Press, 1990), pp. 11 – 16. 引用教宗通谕具体内容时,我注明的是通用的小节号码。

② Jacques Maritain, *Three Reformers: Luther-Descartes-Rousseau* (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1970), pp. 143 – 147, 153 – 154, 160 – 164. 利奥十三在其反社会主义通谕里追溯 16 世纪宗教改革之后西方资产阶的各种思想潮流,包括启蒙运动。教宗甚至指出,无政府主义激进和绝对的平等观念来源自卢梭这种世俗化的平等观,并由此演变为诉诸暴力和蔑视权威的弊端。Leo XIII, *Quod Apostolici Muneris* 2 – 5。

③ 学者一般会追溯现代天主教社会思想和社会运动的起源到利奥十三世《劳工通谕》之前,当时西欧各国的一些开明贵族和高级教士意识到资本主义对社会和信仰的破坏作用,包括法国的阿尔贝·德曼伯爵,德国的冯·克特勒主教,英国的曼宁枢机主教和美国的吉本斯枢机主教。关于这方面系统的阐释,可参见 Roger Charles, *Christian Social Witness and Teaching*, vol. 1 (Leominster, Herefordshire: Gracewing, 1998), pp. 334 – 357。

④ Leo XIII, *Quod Apostolici Muneris* 9 – 11.

市场和农业技术的要求。①

利奥十三世认为社会主义者主张公有制,进而轻视婚姻家庭和家庭财产所有权。这一看法出自对恩格斯《家庭、私有制与国家起源》的误读。恩格斯强调的是在消除阶级和不平等的情况下,夫妻之间的婚姻将建立在单纯爱情的基础上,而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婚姻关系究竟如何,人们唯一清楚的是,这只能“在新的一代成长起来的时候才能确定”。实际情况不是像利奥所说的,“社会主义者把家庭丢在一边,而主张国家的权力”。此外,恩格斯在这里说的是未来才可能实现的、私有财产业已消失的历史发展阶段。他从来没有武断地就未来婚姻模式提出刚性的结论,而是借助引用摩尔根的话来说明,那是“不能预言”的。②

由于无政府主义,即教宗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在欧洲,尤其在意大利、西班牙等最重要的天主教国家,对教会形成了很大的威胁,教宗在其社会通谕里面急迫地反驳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观点,捍卫私有财产权。这一激烈的反社会主义立场同时也迎合了资产阶级当中与教会亲善的温和派的需要,后者此时开始利用他们掌握的政权大肆镇压社会主义者。③

在作为通谕主体的第二部分(第 13 – 36 节),利奥讨论了劳资关系和建立和谐劳资关系的办法,批评了野蛮和放任的资本主义。他首先触及的问题是,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应该建立什么样的良好关系(第 13 – 24 节),然后论及了国家应该在这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第 25 – 36 节)。教宗对社会主义的拒绝和对私有制合法性的强调,在一定程度上出自他对启蒙运动平等观念的否定。19 世纪罗马天主教会的主流立场是,天主面前的人人平等并不导致社会关系中无差别的人人平等:差别、等级和阶级的存在是合理的,劳苦是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劳工状况的改善、阶级之间的合作需要在这一前提下来谋求。④这层意思通常被看作是整个通谕中最保守的部分,因为似乎道德说教在这里被教宗当作了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途径。

其实利奥还是提出了一些触动市场经济的结构性改良措施。他的建议可以分析到四个重要方面:足够过上有尊严生活的工资,劳动场所的环境和劳工保护,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以及国家保护工人权益的责任。国家应该对“每一个阶级都公道”。利奥批评无政府主义者对国家权威的蔑

---

① Leo XIII, *Renum Novarum* 3 – 8. 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与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383 页。恩格斯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不是小农,小农破产和无产阶级化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马克思主义者虽然期望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最终实现,但是与无政府主义者不同,“无论如何不要以自己的干预去加速”小农的灭亡。即便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我们也“根本不能设想用强制的办法去剥夺小农”,甚至不能用强制的办法“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恩格斯:《1891 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269 页;《给“前进报”编辑部的信》,前述书第 22 卷,第 561—562 页;《法德农民问题》,前述书,第 563—587 页,引文见第 580—581 页。关于小农,马克思在《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里面,明确表达了与恩格斯同样的看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第 694—695 页。

② Leo XIII, *Renum Novarum*, 9 – 12.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与国家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96—97 页;恩格斯:《流亡者文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第 585 页。在后面这一著作里,恩格斯批评了布朗基主义者犯了与无政府主义者一样的错误,不是去揭露资本主义用金钱腐蚀家庭关系,而是否定家庭关系本身。

③ 恩格斯:《致意大利劳动社会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给西西里社会党人的贺信》《国家社会主义和意大利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555—560 页。

④ Leo XIII, *Renum Novarun*, 13 – 16. 这一主流立场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教会内部就没有激进的、更加贴近圣经文本的社会和政治思想。参见 Thomas C. Kohler, “Modern Man,” *America*, 17 – 24 August 2009, pp. 22 – 25; Frank MacDonald Spindler, “Lamennais and Montalvo: A European Influence upon Latin American Political Thought,”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37 (1976), pp. 137 – 146; Joe Holland, *Modern Catholic Social Teaching* (New York: Paulist Press, 2003), pp. 50 – 51。

视,认为国家可以在协调劳资关系上扮演关键的角色。重视国家社会改革功能是天主教社会思想与社会主义的一个共通点,尽管 19 世纪的教会往往错误地把社会主义等同于无政府主义。教宗提出要着重保护贫苦阶层,尤其是那些靠工资生活的人:"有钱的人有许多办法可以保护他们自己,那些生活困苦的人们,却没有什么自己的办法可以依靠,所以他们主要须依靠国家加以援手。"①

在 19 世纪中叶到 20 世纪中叶这 100 年里,西方基督宗教各派,尤其是罗马天主教会,在总体上对社会主义采取批评和反对的立场,但是教会在原则上肯定国家干预经济以及改革市场经济结构的作用,又致力于保护劳工和其他社会弱势群体,热切关心"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我们在这里主要以美国天主教会在 19 世纪后期和 20 世纪前期对《劳工通谕》的解读和接受为个案,略为展开这一问题,探讨教会对社会主义异常复杂的态度。

二、"教会必须和人民站在一起"

与很多欧洲国家不同,美国社会对社会主义长期保持着鲜明强烈的抵触情结。在这样一种语境里面,利奥十三世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态度得到了一种独特和激烈的回应。社会主义运动在美国的困难处境主要是美国资产阶级的抵制造成的。②但是正如我们在下面将要谈到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盲动也为资产阶级对左派力量的镇压提供了借口。

教会的保守立场与美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失败 直到 1861—1865 年间的南北战争,美国天主教会的代表人物认识到资本主义工业化带来了严重社会问题,却没有提出具体的新对策,只是重复基督宗教传统的社会说教。教廷的保守立场并不是简单地由罗马向各国教会传播,而是与之互相呼应的。

我们可以把视线转向当时的纽约大主教约翰·休斯(1797—1864)。他在三次演讲中由一个美国主教的立场谈到了他对资本主义的思考和评价。③休斯对 19 世纪资本主义造成的巨大社会冲击有清醒认识。他举英国为例,指出资本家的财富积累与劳工的穷困形成巨大反差,低工资和失

---

① Leo XIII, *Renum Novarun*, 25 – 29.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评巴枯宁派的时候多次指出,无产阶级应该参与资产阶级议会政治来进行阶段性的社会改革,改善自身以及其他劳动人民的状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第 521—526、694—695 页)。然而也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长远期望是,无产阶级政府的使命是改造以致消除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最终造就无阶级的社会。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对国家功能的理解不同于强调阶级调和与并存的天主教社会思想。关于工资、劳动保护和工会问题,可分别参见 Leo XIII, *Renum Novarun*, 17, 29 – 33, 34 – 35, 36 – 42。

② 由南北战争结束到一次大战结束(1865—1918 年),美国政府和垄断资产阶级对左派的压制有过几次高潮,譬如后面将要提及的以 1886 年"秣市惨案"为契机对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左派力量的镇压。另一次高潮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对共产党人和其他左派人士的调查和骚扰。后一次镇压活动中具有代表性的事例是纽约州议会的"勒斯克委员会"。以州参议员勒斯克为主席的该委员会不仅以调查名义袭击和打击左派刊物和人士的正常活动,也借助议会调查的形式煽动民意来压制社会主义和其他左派思潮。学者的晚近研究倾向于强调,表面上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上述镇压活动,在本质上是纽约州资产阶级,尤其是该州北部钢铁公司和其他行业大资本家,针对劳工运动和温和社会改革刻意设计的打击和迫害。参见 William H. Siener, "The Red Scare Revisited: Radials and the Anti-Radican Movement in Buffalo, 1919 – 1920," *New York History* 79, pp. 23 – 54; Thomas E. Vadney, "The Politics of Repression, A Case Study of the Red Scare in New York," ibid. 49 (1968), pp. 56 – 75; Jacqueline Reimen, "Radical Intellectuals and Repression of Radicalism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Revue française d'études américaines* 2 (1976), pp. 63 – 76。

③ John Hughes, "Influence of Christianity on Social Servitude," 29 March 1843, in *Complete Works of Most Rev. John Hughes*, vol. 1, ed. by Lawrence Kehoe (New York: Lawrence Kehoe, 1866), pp. 371 – 385; "A Lecture on the Importance of a Christian Basis for the Sci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 18 January 1844, ibid., pp. 514 – 534; "The Church and the World," 31 January 1850, in *Complete Works of Most Rev. John Hughes*, vol. 2, ed. by Lawrence Kehoe (New York: The Catholic Publication House, 1864), pp. 69 – 87.

业的威胁使得劳工遭受的奴役比古代的奴隶制和农奴制更难承受、更难摆脱。①休斯把基督教道德失去对经济行为的影响看作是资本主义问题的根源,不过他并非空洞和抽象地进行道德说教,譬如他正确地指出,宗教影响的丢失导致了研究经济学说的学者以及他们参与塑造的社会舆论无视劳工的悲惨状况,坚持把私人利益看作是社会经济的活力所在,甚至认为穷人没有权利得到救助,富人有权利拒绝帮助穷人。但是除此之外,他并没有提出有效改革社会结构的办法来改善工人的待遇,甚至呼吁穷人要在自己的困境中保持耐心,友善地对待富有人。②休斯还强调说,美国革命的正当性在于它保护宗教和财产,而不是像欧洲大陆的革命那样打击教会和侵犯财产权。③

直到《劳工通谕》发布前夕,维护资本主义的保守声音仍然在美国教会内部有很大影响。譬如天主教报人乔治·沃尔夫就曾经撰文激烈攻击社会主义。他注意到一些在美国出现的空想社会主义实验遭到了失败,并且认为启蒙运动以来流行的绝对平等观念是这些不切实际的思想和运动的根源。④而另一位天主教徒、著名出版家和作者孔德·帕伦撰文讨论过天主教对社会主义的态度。他的核心观点是,社会主义看重的是借助国家力量来改变整个社会,而真正影响社会状况的是个人品德,因此任何社会改革都是无意义的。⑤如果与帕伦的立场相比较,《劳工通谕》反倒显得激进了。

在南北战争中,种族关系和阶级关系问题始终是交织存在的,争取劳工和少数族裔正当权益的社会运动也往往汇集交融,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社会主义思潮成为一些人分析社会问题的思想方法,但是在这些进步的社会运动之间和内部并没有牢固的团结,争取欧洲移民劳工权益的人同时也可能在冷酷地歧视黑人和亚洲移民,譬如很多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移民以及他们积极参与的一些劳工组织。⑥而与劳动大众的不团结形成对照的,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对工人运动兴起的迅速回应、对所掌握的各种力量的高效整合、以及他们及其代言人对社会主义进行的污名化宣传和有力镇压。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美国无政府主义者反倒显得富有理想,是在坚持不懈地追求社会正义。我们在这里仅以两个重要人物为个案来说明他们的激进言行给社会主义运动带来的损害:马克思和恩格斯关注过的约翰·莫斯特(1846—1906),以及在不公正的“秣市惨案”审判后被处

---

① John Hughes, “Influence of Christianity on Social Servitude.”

② John Hughes, “A Lecture on the Importance of a Christian Basis for the Sci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

③ John Hughes, “The Church and the World.”

④ George Dering Wolff, “Socialistic Commun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Aaron I. Abell, ed., *American Catholic Thought on Social Questions* (Indianapolis: The Bobbs-Merrill Company, 1968), pp. 51 – 70. 教宗利奥在任时期大致与美国历史上的“镀金时代”(由南北战争结束到 20 世纪初)重合。美国历史这个时期的文化和道德在整体上受到资本主义贪婪和粗俗的深度侵润,但是不同的观点和声音也从各个角度对资本主义有所批判,譬如新教人士的社会福音运动和天主教会对《劳工通谕》在美国语境中的解读和应用。参见 Ruth C. Crocker, “Cultural and Intellectual Life in the Gilded Age,” in Charles W. Calhoun, ed., *The Gilded Age: Perspectives on the Origins of Modern America*, 2nd edn. (Lanham,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7), pp. 211 – 237; Richard T. Ely, “Economic Theory and Labor Legislation,”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9, 3rd series (1907 – 1908), pp. 124 – 153。

⑤ Aaron I. Abell, ed., *American Catholic Thought on Social Questions*, pp. 204 – 213.

⑥ Paul Buhl, *Marx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Remapping the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Left*,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Verso, 1991), pp. 71 – 79; Delber L. McKee, “‘The Chinese Must Go!’ Commissioner General Powderly and Chinese Immigration, 1897 – 1902,” *Pennsylvania History* 44 (1977), pp. 37 – 51.

死的艾伯特·帕森斯(1848—1887 年)。①

莫斯特在 1880 年因为其无政府主义立场被开除出德国社会民主党。1881 年 5 月,他发表了《终于完蛋了!》一文,庆贺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被刺杀,并鼓励人们模仿这种暗杀的行为。流亡英国的莫斯特因此被判处 16 个月的苦役,出狱后受到纽约无政府主义者的邀请,于 1882 年 12 月抵达美国,此后就一直在那里活动。莫斯特来到美国之后,无政府主义者在这里鼓噪暗杀等暴力行动的声音就更加响亮了。

1883 年 10 月,莫斯特为美国无政府主义者大会撰写了《匹茨堡宣言》。帕森斯在"秣市惨案"后入狱。在狱中所写的自传里面,他大段引用了这部宣言的文字。②除了对资本主义一般的批评,《匹茨堡宣言》对包括议会、政府和司法机构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也完全否定宗教、学校和报刊等社会制度,认为不仅要用武装斗争摧毁之,而且要立刻建立一个无阶级和无国家的社会。这样一种决绝和激烈的社会态度无疑把教会以及大批群众推到了莫斯特和帕森斯所信奉的政治和社会运动的对立面。

布鲁斯·纳尔逊研究过19 世纪后半期芝加哥的无政府主义者,探索了"秣市惨案"背后的社会状况。他注意到的一个突出问题是,造成那里劳工运动分裂的最主要原因是反基督教的无政府主义者疏远了众多与新教牧师和天主教会关系密切的劳工,譬如爱尔兰裔的移民,疏远了关心和支持劳工的教会人士和很多信教的警察。按照社会民主党原则建立的美国社会主义工党对宗教采取温和宽容的态度,但是仍然无法阻止大批爱尔兰裔天主教移民的退党。很多基督徒认同工人积极争取的八小时工作制,而无政府主义者在勉力推动这一崇高事业的同时又以自己反对宗教和传统家庭婚姻的言论把民众推向对立面。譬如在帕森斯看来,"上帝只有一个,那就是人本身,对其他一切的信仰都是可笑的"。他还坚持认为,宗教信仰意味着人的自主地位受到了挑战,因此以人的自由为目标的劳工运动与否定人的自主性的宗教是完全不可兼容的。③

就帕森斯个人的政治活动而言,他曾经长期信奉和平民主的方法,曾经多次参加地方议会的选举,支持黑人争取平等权利。④他由南方抵达芝加哥之后一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看法,多次投身地方政治选举,但是多次遭遇失败。帕森斯由社会主义转向无政府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出自对资本家镇压劳工运动的激愤。在 19 世纪 70 和 80 年代的芝加哥以及整个美国,在经济危机和劳资关系紧张时期,尤其在 1877 年的大罢工风潮中,资方往往采取非常简单野蛮的办法来应对,并敦促政府动用警察甚至军队来弹压工人

① 没有任何确凿证据证明"秣市惨案"是因此被捕和被判重刑的芝加哥无政府主义者策划和实施的。将他们与炸弹投掷联系在一起的是他们以及莫斯特鼓吹暴力的大量激进言论。美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不仅借此镇压了芝加哥的无政府主义者,也乘此机会破坏了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工人斗争,并抹黑和打击了包括有其他派别的整个美国社会主义运动。恩格斯将该事件描述为"芝加哥的无政府主义蠢举",并提出无产阶级仅仅把斗争目标局限于争取"高工资和短工作日"是不够的。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1886 年 5 月 23 日于伦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第 479—480 页。关于"秣市惨案"以及有关人物的一些历史细节,可参看 Philip S. Foner, ed., *Autobiographies of the Haymarket Martyrs* (New York: Humanities Press, 1969), pp. 1 - 13; Bruce C. Nelson, *Beyond the Martyrs: A Social History of Chicago's Anarchists* 1870 - 1900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165 - 173, 239 - 242; Paul Avrich, *The Haymarket Traged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55 - 67, 446 - 457. 阿弗里奇在这里对莫斯特的生平以及他对芝加哥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有简要的评述。

② "Autobiography of Albert R. Parsons," in Philip S. Foner, ed., *Autobiographies of the Haymarket Martyrs*, pp. 27 - 57, 此处 pp. 38 - 42. 关于帕森斯的事迹,可参见 Paul Avrich, *The Haymarket Tragedy*, pp. 3 - 55。

③ Bruce C. Nelson, *Beyond the Martyrs: A Social History of Chicago's Anarchists* 1870 - 1900, pp. 165 - 170.

④ 帕森斯的祖先参加过独立战争,父亲由缅因州移居到美国南部的阿拉巴马州,他本人在少年时代就因为父母去世到了德克萨斯,与自己的哥哥和姐姐生活,后来参加了南部战争,在联邦军队服役,加入了他哥哥担任将军的部队。"Autobiography of Albert R. Parsons," pp. 22 - 30。

的集会和游行。帕森斯个人不仅被开除和列入黑名单,还遭到芝加哥警察局长的警告,威胁要暗害他的生命。① 1878 年伊利诺伊州议会立法解散工人自发的武装组织,该法令还得到州最高法院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当地一度活跃的工人武装纷纷解散或者转入地下。②

在严峻的社会形势面前,社会主义工党内部就工人的斗争方式发生尖锐分歧。以菲利普·范－派顿为代表的温和乐观一派没有辜负恩格斯对他们的期望,一直抵制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他们那种缺乏斗争耐心、最终疏远民众的暴力口号和行为。范－派顿曾经深刻地揭示看似激进、实质上破坏工人运动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是资本家派来的挑衅者,只会“高喊革命和鼓动流血”,用恐惧把民众驱离社会主义运动, 完全不顾忌长远的社会改革目标,反而为资产阶级镇压工人群众及其领袖提供了现成的借口。但是范－派顿坚持合法政治斗争的纲领并没有被帕森斯所接受,反而促使他离开了社会主义工党。③

教会人士中的改良主义态度　美国天主教教士和新教的社会福音派人士是当时积极谋求劳资关系和谐的两个主要力量,在他们个人之间甚至有一种跨越教派的“统一战线”关系。对他们来说,创造一个和谐、有利于渐进改良的社会环境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排斥无政府主义。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立场,即怀疑和否定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原则,尤其不赞成把所谓的经济学原理看作是凌驾于道德和社会公益之上的、不可撼动不可变更的铁的规律。他们明确认为,近代以来资产阶级所选择的社会发展道路是人为决策的结果,是可以调整改变的,劳工的命运和财富的分配不均是可以通过社会改革来积极改善的。在他们看来,放弃对温和改革的希望,是暴力冲突的根源。④

理查德·伊利(1854—1943)是美国当时顶尖的经济学教授,他也是由新教人士组成的社会福音派运动的重要代言人。他在 1886 年出版《美国劳工运动》一书,系统批判了无政府主义的纲领和策略,同时也阐释了他以及社会福音派对社会改革的看法和建议。在这样强大和普及的改良主义运动面前,莫斯特和帕森斯敌视宗教以及反对和平渐进改革的立场,他们诉诸暴力的激进口号和零散行动,不仅遭受来自保守势力的强大压制,也很容易被受到主流社会影响的大批民众误解和拒绝。⑤伊利的改良主义态度集中体现在他对“炸药”政治不遗余力的谴责之中。与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不同,无政府主义者反对资本主义制度,但是没有清楚明确的社会经济纲领,试图借助激进和暴力的言论和文字来弥补这一

① “Autobiography of Albert R. Parsons,” pp. 31 – 57.

② Paul Avrich, *The Haymarket Tragedy*, pp. 45 – 46.

③ Paul Avrich, *The Haymarket Tragedy*, pp. 46 – 47, 59.

④ 关于社会福音派以及这些宗教人士与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的复杂关系,可参见的经典和晚近研究包括 Charles Howard Hopkins, *The Rise of the Social Gospel in American Protestantis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0); Jacob H. Dorn, “The Social Gospel and Socialism,” *Church History* 62 (1993), pp. 82 – 100; Doug Rossinow, “The Radicalization of the Social Gospel: Harry F. Ward and the Search for a New Social Order, 1898 – 1936,” *Religion and American Culture* 15 (2005), pp. 63 – 106。

⑤ 伊利对改良主义的系统阐释见他如下的三部主要著作。Richard T. Ely, *Labor Movement in America* (New York: Thomas Y. Crowell, 1886); *The Strength and Weakness of Socialism* (New York: The Chautauqua Press, 1894); *Ground under Our Feet: An Autobiography*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38). 关于美国天主教领袖的改良主义立场以及他们对劳工运动的态度,参见吉本斯大主教的如下看法以及他的传记。James Cardinal Gibbons, “The Stake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the Labor Movement,” in Aaron I. Abell, ed., *American Catholic Thought on Social Questions*, pp. 143 – 161; John Tracy Ellis, *The Life of James Cardinal Gibbons: Archbishop of Baltimore* 1834 – 1924, 2 vols. (Westminster, Maryland: Christian Classics, 1987; first published, 1952)。

理论的缺陷。①与恩格斯当时对国际社会主义者的教导相违背,美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对广大民众所珍惜的宗教和家庭采取了简单粗暴的否定态度。伊利还注意到,无政府主义者在反对资本主义的同时,非常奇怪地尊崇个人主义和无情竞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他解释说,这一点以及强烈的反宗教特征与无政府主义的俄国起源有密切关系:被沙俄控制的俄国教会是专制统治和压迫的一个组成部分,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反抗沙俄的立场强化了他们的反宗教倾向,而当时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被他们当作反宗教的科学思想武器。②

伊利的看法是,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改变西方资本主义的革命发生之前,革命者必须对整个社会进行长期和漫长的教育,并在这一过程中以和平的议会活动方式进行斗争,而无政府主义者选择暴力本身作为宣传和教育的工具,甚至不惜以暗杀作为社会鼓动的手段。伊利很明确地指出,这是出自巴枯宁及其追随者的政治策略,并经由莫斯特在美国得到扩散,譬如鼓吹把范德比尔特这样的美国大资本家处以死刑,“吊到路灯杆子上”。③伊利在比较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指出,前者对现状是如此的悲观,以至于否认改善劳工当下福利的措施具有任何意义,譬如实行免费义务教育、禁止童工、加强劳动安全以及提高工资等社会改革。④伊利认为,美国劳工运动应该走和平的社会改良道路,这一点和当时恩格斯对欧美工人运动的见解是一致的。⑤恩格斯在 1886 年 5 月“秣市惨案”刚刚发生的时候,已然感觉到到该事件的严重性以及社会主义运动因此面临的挑战:“芝加哥案件大概要结束美国的无政府主义喜剧了”。到了 1887 年 1 月,他又沉痛地指出,这一悲剧意味着“统治阶级试图用暴力和残酷的阶级的司法机关来镇压工人阶级方兴未艾的反抗高潮”。⑥

美国新教和天主教人士中间的改革派注意团结劳工和密切关注工人福利,引导民众认可基督宗教的社会思想,并以这种特殊方式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的某些重要元素,以至于伊利和那些天主教徒都曾经被保守势力贴上“社会主义

---

① Richard T. Ely, *Labor Movement in America*, pp. 241 – 242. 马克思曾经斥责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说他“除了空洞词句以外,没有任何社会革命的东西”。马克思:《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第 654—708 页,此处第 702 页。马克思、恩格斯对无政府主义最尖锐的批评出自他们 1873 年写作的小册子《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第 365—515 页。他们在该书第 485 页写道:“用刑事犯罪——这个革命的最高体现——的英雄们的破坏一切的行动来代替工人为争取自身解放而进行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

② Richard T. Ely, *Labor Movement in America*, pp. 242 – 248.

③ Richard T. Ely, *Labor Movement in America*, pp. 251 – 268.

④ Richard T. Ely, *Labor Movement in America*, pp. 228 – 230. 参见 Daniel Bell, “The Background and Development of Marxian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Donald Drew Egbert and Stow Persons, ed., *Socialism and American Lif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9), 213 – 405, 此处 233 – 248。

⑤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1848 年至 1850 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591—612 页。

⑥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886 年 5 月 12 日于伦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 卷,第 474—476 页;《美国工人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383—392 页。1986 年是秣市惨案 100 周年纪念,美国学者有一系列文章探讨欧洲社会主义者对这一事件以及对美国工人运动的态度。这些研究充分展示了,巴枯宁、莫斯特和帕森斯推崇暴力的无政府主义原则普遍受到当时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批评和拒绝。参见 Hartmut Keil, “The Impact of Haymarket on German-American Radicalism,”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Class History* 29 (1986), pp. 16 – 27; Raymond C. Sun, “German Social Democratic Response to the Haymarket Incident,” ibid., pp. 53 – 67; Marjorie Murphy, “And They Sang the ‘Marseillaise’: A Look at the Left French Press as It Responded to the Haymarket,” ibid., pp. 28 – 37; Hubert Perrier et al., “The ‘Soc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 European Reactions to the ‘Great Upheaval’ and to the Haymarket Affair,” ibid., pp. 38 – 52。

者”的标签。①

伊利注意到天主教社会思想对资本主义清晰和尖锐的批评。他的一些朋友是天主教教士,包括当时威望很高的巴尔的摩枢机大主教吉本斯(1834—1921)。伊利与我们下面提及的瑞安神父关系密切,他为瑞安的重要著作《生活工资》写过序言,也请瑞安写作介绍教宗社会问题通谕的文字,并将之作为附录收入他自己的自传。②吉本斯这位美国主教团的领袖在推动社会改革的活动中发挥了重大领导作用。他对劳工骑士团等劳工团体的支持既表明了教会对贫苦工人的同情,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防止了他们脱离教会、以暴力手段破坏既定体制的法律和秩序。吉本斯和美国天主教会的领袖们在他们的社会使命中显然取得了两项突出成绩:关怀和照顾工人阶级“最近的目的和利益”,以及借此加强劳动群众与教会的认同。这方面的一个经典事例,就是在“秣市惨案”发生不久之后的 1887 年 2 月,吉本斯呈递给教廷传信部一份备忘录,抗议加拿大魁北克大主教以及毗邻的美国缅因州波特兰主教对劳工骑士团的谴责以及对其中的天主教成员的宗教处分。③吉本斯引用英国枢机大主教曼宁(1808 – 1892 年)的话说,站在教会的立场上看,“资本及其利润不是社会中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所有劳工群众的道德状态和家庭生活条件”,贫苦劳工的悲惨状况绝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吉本斯抗议说,教会“失去对民众的影响力就等于整个地失去了未来”。学者们一般都认为,代表美英天主教会和重视社会正义问题的吉本斯和曼宁,与德法等国的进步教徒和教会人士一起,推动了利奥十三世组织起草和发布《劳工通谕》。④

对吉本斯来说,对协助他写作劳工骑士团备忘录原初法文版本的明尼苏达圣保罗大主教艾尔兰(1838—1918)来说,重要的不是“主义”问题,而是教会能够站在被资本压迫的劳工群众一边。就像艾尔兰对吉本斯所说的:在支持劳工的问题上,“你做了先知的工作。人民才是力量,教会必须和人民站在一起。我希望我们所有的主教们都明白这一真理”。对吉本斯来说,最重要的应该不是教会如何训导劳工大众做正确的政治选择,而是主教和神父们如何让民众感受到真切的关爱,并因为这一爱的召唤而坚守自己的信仰。吉本斯认为教宗所担心的无政府主义主要是欧洲问题,在美国没有很大影响,而这里真正的威胁来自贪婪无度、名义上信奉基督教的资本家,他们对贫困劳工的冷漠既是他们自己背弃信仰的证明,也动摇了教会在人民心中的地位。在吉本斯看来,致力于照看工人利益和建立和谐劳资关系的企业主教徒其实就是一位“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⑤

---

① Theron F. Schlabach, “An Aristocrat on Trial: The Case of Richard T. Ely,” *The Wisconsin Magazine of History* 47 (1963 – 1964), pp. 146 – 159; Benjamin G. Rader, “Richard T. Ely: Lay Spokesman for the Social Gospel,”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53 (1966), pp. 61 – 74. 除了这类支持伊利社会思想的作者,晚近的美国社会并不缺少极端保守地反对伊利社会改革理念的立场,即指责伊利受到社会主义的影响,试图将社会主义元素加入到美国的社会政策中去。参见 Luigi A. Bradizza, *Richard T. Ely's Critique of Capitalism*,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Dallas, 2008), pp. 27 – 30, 402。

② Richard T. Ely, *Ground under Our Feet: An Autobiography*, pp. 78, 93 – 94, 289 – 294. 关于伊利与瑞安的关系,还可参见 Leo V. Ryan, “American Protestant and Catholic Social Concerns circa 1890 and the Ely-Ryan Relationship,” *Review of Social Economy* 49 (1991), pp. 514 – 531。

③ John Tracy Ellis, *Documents of American Catholic History*, 2 vols. (Chicago: Henry Regnery Company, 1967), vol. 2, pp. 444 – 457; Aaron I. Abell, *American Catholic Thought on Social Questions*, pp. 143 – 147. John Tracy Ellis, *The Life of James Cardinal Gibbons*, *Archbishop of Baltimore* 1834 – 1921, 2 vols., replica edition (Westminster, Maryland: Christian Classics, 1952/1987), vol. 1, p. 507.

④ John Tracy Ellis, *The Life of James Cardinal Gibbons*, *Archbishop of Baltimore* 1834 – 1921, vol. 1, pp. 448, 450 – 451, 454, 486 – 546. 引语见 John Tracy Ellis, *Documents of American Catholic History*, vol. 2, p. 452。

⑤ John Tracy Ellis, *The Life of James Cardinal Gibbons: Archbishop of Baltimore* 1834 – 1924, vol. 1, pp. 521 – 529; James Gibbons, “Wealth and Its Obligations,” *The North American Review* 152 (April 1891), pp. 385 – 394.

教宗和教廷以及美国各种保守力量呼吁抵制社会主义的声音,对吉本斯的主要影响体现在他反对铁路等重要资产国有化的言论上。吉本斯在一次大战期间任命了一些主教负责研究战后社会改革,其成果就是美国教会 1919 年 2 月 12 日发表的《社会重建纲要》。该文件系统提出了建设福利国家的方案,主张就最低工资立法,为劳工建设公共住宅,国家出面控制垄断资本,实行递进所得税和针对高额利润和遗产继承征税,建立合作社,鼓励工人拥有企业股权和参与企业管理。而在当时的美国制造业协会主席斯蒂芬·梅森看来,这部充满进步意味的文件实质是在以教会的权威和名义宣传社会主义。不过他呈递给吉本斯的抗议信件没有得到回复,吉本斯甚至可能不屑一读。当时还有教会人士在该文件发表后请求吉本斯专门为驳斥社会主义发布一个声明。吉本斯的传记作者埃利斯教授认为,没有证据表明大主教接受了这一请求。而直到他临终前的岁月里,吉本斯还是在各种场合不断地强调:如果教会努力去保护劳工,她就得罪了所有拥有财富和权势的人;但是如果不这样做,"教会将背叛自己的整个历史。这是教会绝不能做的"。①

大主教艾尔兰曾经在法国接受神学教育,在欧洲和那里的教会有一定知名度,因为其维护劳工利益的立场被称为"社会主义主教"。1894 年 8 月,他在与法国《费加罗报》记者的谈话中,系统表述了他对社会主义的看法。艾尔兰申明,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并不否定私有权的合法性。他并不反对拥有巨额财富的大企业,但是大资本的发展不能以小企业和劳工利益受损为代价,政府和立法机构必要时要为此进行干预。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意味着,政府为保证社会正义要在经济领域进行合理适度干预。艾尔兰指出:基督教人人平等的观念并不否认人的能力和社会地位有差别,而是强调一部分人的利益和发展绝不能以伤害另一部分人的尊严为代价;依照基督教社会思想传统,私有权是重要的和必要的,但是不是绝对的,其历史形式曾经经历过变化,其现存的形式也会演进,并且会出现地域性差异。私有权的合法性在于公正的财富分配,在于保证民众家庭生活的稳定。他承认,社会主义运动在促使人们更加深刻和全面地思考社会公平问题。②

三、多元社会结构:资本、合作社与社会主义

执笔起草美国教会战后《社会重建纲要》的约翰·瑞安神父一直认为自己对天主教社会思想的理解,在很大程度源自吉本斯大主教的思想和行动,尤其是后者对劳工始终不变的关爱和保护。与身居教会高级职位、言行在很大程度上必须提防各种保守势力批评的吉本斯和艾尔兰大主教不同,瑞安神父,作为长期在艾尔兰所在主教区神学院任教的道德神学教授,对社会主义的态度要开放和开明得多。他在 1909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里面直截了当地提出,利奥十三世在《劳工通谕》里面所谴责的社会主义具有特定的含义,其实是激进的无政府主义主张,譬如以国家权威取代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权利。瑞安对《劳工通谕》的解读强调说,天主教会并不反对社会主义的如下主张:公共的或者国家所有的关键工业是社会经济的重要部分,但是私有经济与公有经济并存,生活资料为私人所有和个人支配;教会重视的个人家庭权利以及家长对子女的教育责任得到社会和国家的尊重。如果对社会主义做这样的理解,瑞安认为,一位教徒可以信奉社会主义,可以是一位社会主

---

① John Tracy Ellis, *The Life of James Cardinal Gibbons*: *Archbishop of Baltimore* 1834 – 1924, vol. 1, pp. 534 – 546. 参见 John Ireland, "American Citizenship," in idem, *The Church and Modern Society*, 2 vols. (New York: D. H. McBride, 1903), vol. 1, pp. 185 – 214, 此处 pp. 208 – 210; "Labor and Capital," in ibid., vol. 2, pp. 343 – 375, 此处 pp. 368 – 375。

② John Tracy Ellis, *Documents of American Catholic History*, vol. 2, pp. 489 – 494. 参见 John Ireland, "Personal Liberty and Labor Strike," in idem, *The Church and Modern Society*, vol. 2, pp. 327 – 340; "Labor and Capital," in ibid., pp. 352 – 353, 359 – 360。

义者。①

瑞安在 1906 年以《生活工资》一书成名。他 1915 年 9 月开始在华盛顿的美国天主教大学任教,但是在此前后他对社会主义与天主教信仰的关系问题发表过比上述文章更加系统的意见,他也与美国社会党的主要理论家希尔奎特进行过对话。②与他前述 1909 年的文章相比,瑞安后来对社会主义的态度应该没有原则性的变化,但是语气和侧重上却显得更加保守,对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谈的比较多,对教会主张与社会主义的共通处谈得更谨慎和隐晦。而他对社会主义认识变得更加细腻的地方在于,他开始重视实验和探索在社会改革中的极端重要性。瑞安在和希尔奎特论战时明确说过,他并不在原则上否认,作为社会进步的一个高级阶段,将来会有一个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出现,只是在这个高级阶段出现之前,不仅局部的渐进的改良的意义和必要性应该得到充分的认识和肯定,而且人们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办法,因为人们不能把目光盯在固定的理论模式上,不可能在短期内就做出单一全面的国有化选择,不可能一蹴而就地把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纳入国家调控之中。③瑞安在原则上并不否认,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令人厌恶的现象。他声明,他对此的义愤与希尔奎特一样强烈。他特别提出,把教会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坚定支持者是完全错误的,教会历来的主张是建立和维护一个财富大致平均拥有的社会。④

那么瑞安对希尔奎特期盼实现的消除私有制的高级阶段社会主义为何还有反对意见呢?瑞安自己使用的表述是,他所谈论的是符合现实经济状况的事实,而不是希尔奎特所谈论的未来以及对当时人来说还从来没有在现实中实施过的、100% 的国有化计划经济。也就是说,瑞安侧重关注劳工和民众“最近的目的和利益”,不愿意对长时段之后的未来进行具体的规划和预测。他赞同希尔奎特的说法:资本主义制度最坏的特征之一就是无法利用业已取得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来改善劳工的生活。他们的分歧在于,希尔奎特希望立即实行全盘国有化,一劳永逸告别资本主义,而瑞安认为还有很多改良进步的工作是可以立即开始实施和逐渐完成的,譬如对女工和童工权益的保护、工厂安全和卫生环境的改善、工伤保险制度和最低工资立法等等。与希尔奎特的见解不同,瑞安并不追求消除社会弊端“激烈和永久的药方”,而是试图处理眼前可以缓解的危机。⑤

也就是说,在瑞安看来,针对资本主义的改革并非是目标被固定和限制的有限社会改良,亦非一步到位的激烈短促方案,而是对未来保持开放、经过实验和实践的探索来逐渐前行的行动纲领。那么由这一行动纲领展望未来,人们是否能够看到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经济生活的主导呢?

在瑞安关于社会改革的另外两种著述中,也就是在《教会与社会主义》和 1919 年他为美国主

---

① John A. Ryan, “May a Catholic Be a Socialist,” *The Catholic Fortnightly* 16 (1909), pp. 70 – 73. 瑞安在自传里曾经谈到,他本人社会思想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天主教学者以及吉本斯、艾尔兰等高级教士的影响。参见 John A. Ryan, *Social Doctrine in Action: A Personal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941), pp. 9 – 39. 关于瑞安的生平,可参见彭小瑜:《美国神父约翰·瑞安关于家庭生活工资的思想》,《世界历史》2010 年第 3 期,第 113—123 页。

② John A. Ryan, *A Living Wage: Its Ethical and Economic Aspects*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906); *The Church and Socialism* (Washington D. C.: The University Press, 1919); Morris Hillquit and John A. Ryan, *Socialism: Promise or Menace*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14). 后两部是瑞安神父讨论社会主义问题的代表性作品,其中最后一部是他和美国社会党人希尔奎特就社会主义问题进行的对话和争论文集。

③ Morris Hillquit and John A. Ryan, *Socialism: Promise or Menace*, pp. 44 – 47, 253. 值得注意的是,希尔奎特强调说,未来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会给予教会任何特权,也不会干预教会的内部事务和信徒的宗教生活,在宗教问题上采取的是宽容和自由的立场。参见 *Socialism: Promise or Menace*, pp. 213 – 215; Morris Hillquit, *History of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Funk and Wagnalls Company, 1903), pp. 349 – 353。

④ Morris Hillquit and John A. Ryan, *Socialism: Promise or Menace*, pp. 230 – 249.

⑤ Morris Hillquit and John A. Ryan, *Socialism: Promise or Menace*, pp. 30 – 31, 39 – 42.

教们起草的《社会重建纲要》里面,他仍然认为国家应该出面进行社会改革,并最终建立劳动者拥有生产资料、人际关系富有合作精神的社会。如此的改革一旦成功实现,瑞安声称他所认同的“既定制度”,即美国当时的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制度,其实就已经不复存在了。在这个意义上,瑞安确实配得上美国保守势力给他戴的那顶帽子,即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在 1918 年为《纽约晚间邮报》所写的连载文章“教会与社会主义”中,不仅提出具体的近期的改革方案,还对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做出界定,其实是在此基础上接受了社会主义经济纲领核心与基本的部分,尽管在表述中他多次提出他的社会改革纲领并非是“社会主义”的,多次试图划清自己的设想与社会主义主张之间的界线。①

被瑞安理解为社会主义而加以排斥的主要元素,是他以及当时世界上赞同和反对社会主义的人们都还没有见过的全盘国有制,他们对此的负面看法都是理论上的推测和演绎。②事实上,瑞安表示,他本人提出的社会改革建议与社会主义者在经济方面的很多主张是一致的。在瑞安看来,在推动与劳工群众“最近的目的和利益”相关的社会改革方面,教会的行动纲领和社会主义者的经济改革并无分歧。③

在“教会与社会主义”的结尾部分,瑞安对利奥十三世社会思想做出的解读是激进透彻的,长期被一些保守的教会人士有意无意忽略:资本主义问题在根本上还是所有制问题。④利奥固然不赞成全盘的国有制,但是他所认同的良善社会是财富普惠和均衡分配的状态。瑞安在对之进行解读的时候还更加具体地考虑到现代化工业和经济的特点,而不是仅仅在谈论农业和工商业传统的小生产模式。他坚持认为,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财产相对均衡配置的格局是可以实现的,而且这是实质性的社会改革必须完成的目标,因为仅仅依靠提高工资、改善劳工福利和社会保障并不能真正将人格尊严还给广大劳动者。那么瑞安就此提出的办法是什么呢?他很明确地提出,在原则上,无论是在农业还是在工业领域,国家需要使用部分经济领域公有化等手段,来协助农民和工人获得更大份额的生产资料所有权,改变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财富和经济生活控制权力过度集中于少数私人手中的情形,不过国有或者地方政府公有的经济不是排他的单一方案。瑞安清楚地认识到,私有的小生产经营模式已经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他提出的具体方案之一,是能够适应现代工农业和商业的集体所有制下的合作社经营模式。

《分配正义》是瑞安在《生活工资》之外的另一部代表作,其中的第 14 章集中讨论了“合作社运动”。合作社对瑞安来说,最大的意义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更加平均地分配财富,改变农工商各行业和银行业的结构,帮助农民、商人和消费者以更低的成本投资、经营和积累财富。⑤我们会很清晰看到,瑞安在写作此书时候理解的社会主义理论以及在他生前所看到的苏联模式社会主义,都把社会主义比较简单地等同于全盘的国有制。而瑞安则把在历史实践中成为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合作社以及重要资源和水电交通等公用事业的公有制,都看作是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重要方式。他明确指出,合作社和部分关键工业的公有制有助于改变资本主义贪婪社会利润和财

① John A. Ryan, “The Church and Socialism,” in *The Church and Socialism*, pp. 1–34; “John A. Ryan and the Bishops’ Program of Social Reconstruction, February 12, 1919,” in John Tracy Ellis, *Documents of American Catholic History*, vol. 2, pp. 589–606. 这份文献原本是瑞安在 1919 年写作的一本小册子,希望以此参与当时欧美各国对战后重建问题的讨论,但是美国主教们对其有很高的评价,决定将其作为主教会议的文件发表。

② “Church and Socialism,” pp. 1–34.

③ “Church and Socialism,” pp. 15–16.

④ “Church and Socialism,” pp. 21–23, 30–34.

⑤ John A. Ryan, *Distributive Justice: The Right and Wrong of Our Present Distribution of Wealth*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13), p. 428.

富集中于垄断资本家的问题。①

一位现代社会的工人只有在成为生产资料(即资本)所有者之后,他才能真正获得自由,成为自尊和自信的现代社会公民。②而帮助广大民众拥有和运营资本的一个良好途径就是合作社。在瑞安眼里,合作社的形式多种多样,其本质就是由经济状况相对弱势的民众联合组成工农业生产、商业贸易和信贷金融的互助团体。这些经济组织的利润和利息由这些民众分享,信用合作社则以优惠的条件为其成员提供资金。很多地区有成功的农业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而在工业生产领域,完全由工人拥有的合作社形态企业在经营上成功的例子还不多,发展合作社运动还需要进行更多探索。如果我们仔细阅读瑞安对合作社运动意义的阐释,他对资本主义的质疑和批判是相当彻底的。譬如他认为,合作社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工人自己拥有和控制了生产资料,充分享受了自己的劳动成果,但是这不是滋生贪婪和自私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而是培养公益、互助和积极参与精神的集体所有制——在这里,“集体”即合作社的所有制意味着参加合作社的每一个成员都有所有权的个人份额,个人的所有权并没有被集体吞噬。与此同时,合作社又能避免全盘国有制统合整个经济的困难,能够利用市场机制来保证效率。在社会政治生活的层面,瑞安强调说,少数人排他性占有巨额财富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很难避免在社会革命中解体的命运。③

换言之,瑞安并不以为复杂的社会经济可以只保留一种单纯的模式。他认为经济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经济制度是实践的结果,因此绝不会止于私有企业、集体所有制合作社以及公有制企业这三大典型模式,甚至还会依照经济活动千变万化的需求衍生出无数中间和过渡形态。为说明公有制经济的效率问题,瑞安曾经引用了斯克尔顿评论社会主义的精辟言论,对混合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的效率表示肯定:“有限范围的公有制能够成功,恰恰是因为它在经济生活中不是全方位的”,是与其他所有制并存的。④

瑞安提出,国有或者地方政府公有的铁路、电信和水电等公用事业在总体上有利于社会公益,而森林、矿产、河流、石油和天然气以及这些资源所在的土地更应该是国有的,以防止它们被私人垄断,成为私人资本造成进一步财富不均的手段。根据对欧美历史实践的观察,瑞安始终不赞成经济的全盘国有化,同时也承认公有经济在管理上的低效率和可能出现的官僚主义问题。即便如此,他还是坚持认可公有经济的正当性和重要性:“市政府街车服务的管理效率不是太好,不过 3 美分的车票和周全的服务还是要比私营街车公司精打细算、一张票卖 5 美分的服务要更好。”⑤

瑞安看好合作社,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这一经济制度的道德教育作用:劳动者原本是没有机会参与企业管理和承担经营责任的,而通过参加合作社的劳动及其管理,他们的主动性、自信、自律和自我管理的能力,以及他们与他人沟通和协商的能力,都会得到培养和提高。他们由此增加的责任心和协调能力也意味着,他们为了保证合作社经营的成功还学会了克制自己的私心和加强利他主义的精神。⑥瑞安没有明确指出的是,公有经济的教育作用其实也与合作社类似:当人们看到公营街车的服务由于比较少考虑牟利,在价格和质量上都胜过私营的街车,他们自然而然会看到公营经济在社会生活中不可替代的良好作用,看到社会效益在某些情况下需要被置放在经济效益之上。

在瑞安讨论合作社问题的结论中,他就美国社会理想经济制度所提出的设想完全是激进的,绝不会为当时的美国资产阶级所接受的:一个和

① John A. Ryan, *Distributive Justice*, pp. 163 – 165, 211 – 212.

② John A. Ryan, *Distributive Justice*, pp. 213 – 214.

③ John A. Ryan, *Distributive Justice*, pp. 214 – 228.

④ John A. Ryan, Distributive Justice, p. 165; Oscar Douglas Skelton, O. D. Skelton, *Socialism: A Critical Analysis*, reprint edn. (London: Constable and Company, 1920), pp. 214 – 219.

⑤ John A. Ryan, *Distributive Justice*, pp. 95 – 96, 163 – 167.

⑥ John A. Ryan, *Distributive Justice*, p. 229.

谐稳定的现代社会,一个能够让最大多数人发挥自己能力和获得发展机遇的社会,应该有这三大类型的经济制度,即纯粹和简单的私人企业,起到平衡垄断资本作用的国有和地方政府所有的企业,以及在农业、工商业和零售业中运作的合作社企业。这三大类型的经济制度在适宜它们各自特点的领域可以获得最大限度的优势,因为“我们经济生活的各种因素以及人类的各种能力实在是太多样和太复杂了,很难被人为地统合在单一的制度里面,不管它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还是合作社”。①

此处的行文表明,瑞安的行文有时禁不住透露出他对社会主义公有经济的认可。不过在更多的场合,迫于美国社会敌视社会主义氛围的压力,他总是在努力声辩他不是“社会主义者”。但是他始终坚持用曲折委婉的话语来吸收和表达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元素,就像前面我们已经提及的他与希尔奎特的讨论和争论。在瑞安完成于二次大战前夕的自传里面,他回顾了自己针对美国资本主义提出的社会改革倡议。他在这里的立场仍然是,国有制和地方政府公有制仍然是社会经济不可或缺的成分。②

瑞安不赞成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不赞成部分社会主义者对宗教和道德问题的解释,不过他最反感的是美国流行的反社会主义态度,即把反社会主义作为抵制社会改革的理由,尤其是把 19 世纪教会对无政府主义的批评简单化、非历史地看作是对社会主义在原则上的彻底否定,甚至把支持工会和维护劳工利益也当作是教会社会思想的对立面,把呼吁社会改革的人士“丑化为”社会主义者。瑞安不得不承认,他对社会问题的一些关键看法,譬如认可公有制在国民经济某些领域的重要性以及认可政府干预社会经济的重要职能,与社会主义者所倡导的改革是一致的,同时也完全符合天主教会传统的社会经济教导。正如一位美国新教人士对他说的,你可以把你的“激进”观点说成是教宗的指示,而我们却只能自己去对付教会内部的保守派意见。尽管如此,瑞安还是难以摆脱焦虑感,不过他拒绝妥协,拒绝屈从于来自保守派的压力,并把遭遇上流社会的蔑视和敌意看作是无足轻重的:

> 我真的有什么需要惧怕的吗? 来自教会的谴责? 我认为我并没有背离教会的教导。教会上层怀疑我的思想和作品的正统性? 企业家和报刊对我进行谩骂? 了解到在社会最顶层的圈子里,提及我的名字的人对我没有好感? 一个正常人不可能不在乎这些批评的态度。我不想在此假装说,我因此感到高兴。但是我并不需要太大勇气来抵御那些批评造就的压力。我所需要的,是认识清楚生活中什么是最重要的。如果因为那些反对声音,我就放弃传播正确的思想,那我就完全荒废了自己的职责,我就背离了真理,我就不单单舍弃了天主赋予我的才华,甚至可以说玷污了它。③

如前所述,在一次大战结束之后,在写作 1919 年成为美国天主教会官方文件的《社会重建纲要》时,瑞安坚持了自己对公有制和政府经济干预的肯定看法,因此遭遇到来自美国垄断资本和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换言之,美国社会此时就有有效的改革办法来预防十年之后发生的“大萧条”。后来罗斯福的“新政”措施与瑞安这里提出的改革建议大体类似。天主教会的这部《社会重建纲要》,尤其是其中倡导和支持合作社运动的内容,被纽约州议会反共的“勒斯克委员会”指责为具有社会主义倾向。让这个委员会最紧张的,是瑞安在该纲领里面提出的下述意见:工人阶级的多数“必须以某种方式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尽管这并不意味着私有制要被废除。④

四、小结和余论

敌视社会主义倾向长期是美国文化主流特征之一。伍德罗·威尔逊总统19 世纪 80 年代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读书,当过理查德·伊利的研究生。在后者的记忆中,威尔逊是正派、有社会责任心的优秀青年。不过在一次演讲中,威尔逊把社

① John A. Ryan, *Distributive Justice*, pp. 164 –165, 232 –233.

② John A. Ryan, *Social Doctrine in Action*, pp. 108 –110.

③ John A. Ryan, *Social Doctrine in Action*, pp. 101 –127.

④ John A. Ryan, *Social Doctrine in Action*, pp. 147 –149.

会主义者说成是那些“披着长发和怒瞪双眼”的野蛮人。伊利好奇地问,你我都知道社会主义者不是这样的人,干吗要这么说呢?威尔逊回答说:“如果我们说这样的话,人们会以为我们是保守派,之后我们就可以放心去做具有进步意义的事情。”①伊利、瑞安和其他社会改革的推动者不得不长期和无奈地声明自己不是社会主义者。威尔逊这番话生动刻画出了美国社会敌视社会主义的氛围,不仅对他的老师伊利因为改革思想所遭遇的坎坷做了一个蛮好的注释,也印证了瑞安的观点,即敌视社会主义的最大弊端就是这一倾向往往成为拒绝批评资本主义和拒绝社会改革的借口。

正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论近代基督教社会改革的时候所指出的那样,瑞安以及其他美国基督宗教社会改革者的长处和短处都在于他们特别关注劳工“最近的目的和利益”。由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存在种种误会,或者在原则上不认可或者不愿意明确赞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世界历史发展的远景展望,在借用反社会主义名义抵制社会改革的保守势力面前,他们时常表现得软弱,难以理直气壮地批判资本主义和捍卫他们热心推动的改革事业。由于他们的主要关注点是现实和具体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这些改革派的行动方案不容易受制于简单化的抽象理论模式。他们善于用实验和实践的眼光去策划改善民众的眼前利益,强调经济模式和制度需要适应生活本身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譬如瑞安倾向于看好私人资本、合作社以及公有制三种模式混合并存的经济形态。他甚至认为,在这三种模式之外还会出现适应现实经济生活需要的众多其他形态。

也是因为这些基督宗教的社会改革派关注劳工“最近的目的和利益”,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16、17世纪以来西方教会对资本主义贪婪妥协甚至合作的态度。②

Taking Care of the "Immediate Aims and Interests" of Workers: Pope Leo XIII's Encyclical *Renum Novanum* and Its Reception by American Catholics

Peng Xiaoyu
(*Department of Histor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Renum Novanum*, an encyclical issued by Pope Leo XIII in 1891,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modern Catholic social teaching. Evidently critical of certain principles of socialism, it was itself considered by conservative Christians, Protestants and Catholics, to be extremely progressive because the document enunciated the Roman Catholic position on social justice and demonstrated that the Church did find common ground with the socialists in promoting the "immediate aims and interests" of workers.

American Catholics had their share of conservatives who harbored hostility to moderate social reforms and never hesitated in offering frantic resistance against any perceived traces of socialism. This historical milieu rendered it very difficult for progressive Catholics to propose social reforms, and often led them to defend themselves by renouncing their affinity with socialism. Reform-minded churchmen understood that they had to convince the working class of the sympathy of the Church in order to maintain its moral and religious influence. They also tried to avoid endorsing any single scheme of social development. They believed that one rigid plan, whether capitalism, socialism, or co-operation, would prove an intolerable obstacle to social progress, because the elements of economic life were too varied to be forced into only one system.

Key words: Catholic social thought, socialism, American intellectual history, church history

(责任编辑　郑　园)

① Richard T. Ely, *Ground under Our Feet*: *An Autobiography*, pp. 108 – 114.

② R. H. Tawney, "Religious Thought on Social and Economic Questions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III: The Social Ethics of Puritanism,"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31 (1923), pp. 804 – 825. 托尼在这里尖锐批评了新教伦理认可资本主义贪婪的弊病,毫不含糊地驳斥了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基本观点,尽管由托尼的文字,读者总是能读出一个英国绅士的委婉和温润语气。